

主编 李天纲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哲学（第一辑）

社会意识学大纲 (上卷)

〔俄〕波格达诺夫 著 陈望道 施存统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非外借

主编 李天纲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哲学（第一辑）

社会意识学大纲

〔俄〕波格达诺夫 著 陈望道 施存统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社会意识学大纲/李天纲主编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7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. 哲学)

ISBN 978-7-5520-1811-0

I. ①社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社会意识学—研究 IV. ①B0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2173号

社会意识学大纲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 200025

电话总机 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排 版: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印 张: 32.25

字 数: 41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1811-0/B.187

定价: 148.00元(精装)

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“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”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“西学”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“百年翻译运动”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“东方”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“文艺复兴”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“西学”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“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”、“中国的文艺复兴”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“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”利玛窦（Mateo Ricci, 1552—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“西学”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：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“科学”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“西学东渐”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“范围亦限于天文、历算”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“西学”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“运动”。各种原因导致了“西学”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

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“中国礼仪之争”的影响；欧洲在 1773 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“西学”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“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”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“戊戌变法”之前的“西学”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“西学”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“西学”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“翻译运动”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“汉译名著”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 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“大学堂”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“书院”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“四书五经”之外，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“西方经典”，甚至到了“言必称希腊、罗马”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“民国西学”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“现代化”、“世俗化”、“理性化”，都与“民国西学”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“民国西学”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

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,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?“西学东渐”的代表,明末有徐光启,清末有严复,那“民国西学”的代表作在哪里?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,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,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“西学”著作,束之高阁,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,1935年,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,“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”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,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,分为:“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”。一瞥之下,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“人大图书分类法”更仔细,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“社科规划”和“文化战略”,“民国西学”却在“中国的文艺复兴”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(上海,生活书店,1935),在“社会科学·社会科学一般·社会主义”的子目录下,列有“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”等;在“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”的子目录下,列有“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”等,翻译、研究和出版,真的是与欧美接榫,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“民国西学”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,而我们却长期忽视,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“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”,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,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“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”、“中国的文艺复兴”,接续当时学统,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,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,编辑“中国文化史丛书”,一个宗旨便是要接

续 1930 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“中国文化史丛书”，重振旗鼓，“整理国故”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“西学”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“接续”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“老三论”、“新三论”、“后现代”、“后殖民”等等新理论，对“民国西学”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“严译八种”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“西学”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“西学”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“反独裁”、“争民主”和“抗战救国”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 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；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“民国西学”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“断裂”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“改革、开放”以后，又一次“西学东渐”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“西学”，用新的

取代旧的,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:“熊瞎子掰包谷,掰一个丢一个。”中国学者在“西学”武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,在层出不穷的“西学”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:更新的理论,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,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,或者借用,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“西学观”,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,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“西学”,一般是以五四“新青年”来代表,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“西学”,倡导“启蒙”时居功至伟,但是“新文化运动”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,也使得这一派的“西学”浅尝辄止,比较肤浅,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“民国西学”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,有一个宗旨是要“输入学理”,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,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,说“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,便曾经发行过一期‘易卜生专号’,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,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‘马克思专号’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‘杜威专号’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,也就习以为常了。”(唐德刚编译:《胡适口述自传》,北京,华文出版社,1992年,第191页)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,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“真理”的轨迹。三四十年间,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,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;从不列颠宪政学说,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,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,大致就是“输入学理”运动中的全部“西学”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:“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,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。”胡适并不认为这种“活学活用”、“急用先学”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,二十世纪中国知识

分子接受“西学”的方法论,大多认为翻译为了“救国”,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,这就是“天经地义”。今天看来,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“实用主义”,是生吞活剥,不加消化,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,或曰:是“夺他人之酒杯,浇自己之块垒”。从我们收集整理“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”的情况来看,“民国西学”是一个比北大“启蒙西学”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,我们认为“五四运动”及其启蒙大众的“西学”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,在北大的“启蒙西学”之外,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“民国西学”。或许我们应该把“启蒙西学”纳入“民国西学”体系,“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”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: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,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,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,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,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,不中不西,并非简单的外来“冲击”所致,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,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,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,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,那便是“欲求超胜,必须会通;会通之前,必先翻译”。反过来说,“翻译”的目的,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,而非搬用;“会通”的目的,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,而是一种创新——“超胜”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“民国西学”,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,值得我们捡起来,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,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“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”,献弁言于此,是为序。

2016年3月20日,于阳光新景寓所

〔俄〕波格達諾夫 著 陳望道 施存統 譯

社會意識學大綱
(上卷)

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初版



波格達諾夫畫像

社會意識學大綱

上 卷

譯者序言

本書是阿.阿.波格達諾夫所著社會意識學底全譯。所謂社會意識，就是指言語，文字，藝術，哲學，宗教，道德，習慣，法律，思想，科學，等“文化”，或“精神文化”，所以實際就是一部文化學。又因解說的順序，採用所謂歷史的順序的緣故，實際又就是一部文化發達史。

這樣系統地科學地敘述社會意識的教科書，正如著者自己說，以前並不曾有過。以前並非全不認識社會意識在生活裏所演劇目的重要性，也非全無科學風的關於社會意識的研究，更不是沒有

寫述這樣一本書的科學的材料。只是事實，從不曾有人將社會意識具何性質，怎樣發生，成何形態，怎樣在人間發展，循着什麼法則變化遞嬗，現正向着何方進發，等等，也像別的科學底教科書一樣，寫成這樣一本，討論文化全體而有科學風貌的書。就這一點說，這書正可以說是一部很富創造性的文化學或文化發達史。

著者阿.阿.波格達諾夫 (A. A. Bogdanow, 1873—1928) 是個博學多能的人。在知名的作品中有他底創作“紅星”；他底文藝批評集“藝術與勞動者”也為研究藝術理論者所不可不讀的文獻。他於經濟學也造詣甚深——所著的“經濟科學，”中國已有兩種譯本；於醫學也有精深的研究——去年四月七月底他底死，據說就是做了血清醫學實驗底犧牲，而關於社會意識底研究，更為世界上有數的學者。

他底意思，如書所示，認言語為社會意識最初的現象。而言語是社會底產物，是社會現象之一；假如沒有社會上人人相與的關係，就沒有言語存

在底必要，也就沒有言語發生底可能。所以他於言語底發生，也如偉大的言語學者諾伊累（Ludwig Noirè）一樣，認為和勞動技術的過程有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。諾伊累研究了言語和思想，曾經下結語，說言語和思想底原起，存乎人類底共同勞動，原始的共同社會。阿.阿.波格達諾夫也說言語底本原出於勞動時際所發的亥育杭育的呼聲；而又為組織技術的及經濟的過程所不可缺的要素。在這書中，雖不曾如他所著的“經濟科學”中一樣明顯地說，倘若沒有言語，勞動便會像建築巴別塔一樣，終於不得成就，而隱隱之中仍然含有這意思（建築巴別塔的故事見“舊約”“創世記”第一章）。可知他認言語和技術關係底密切。至思惟，他以為，就是心裏的言語，和言語並無本質的區別。這是他所謂社會意識底基本要素。除這基本要素——言語和思想——而外，如文字，藝術，道德，法律，等意識形態，他也以為，都是直接間接和術技的和經濟的過程有關係，而且都在演作組織技術的和經濟的過程的劇目。他認社會意識和社

會勞動這樣的密切有關，所以他說，倘不研究技術的發達，明悉技術發達和社會意識消長底關係，即使研究社會意識也沒有什麼益處。

而這書，在這見解之下，便不能不涉及下起於和自然爭存，上迄於高及雲天的寬廣的領域。

以他學問底豐富，眼光底銳利，自然敘述這樣寬廣的領域，也可以沒有窘狀，而且不會沒一獨到處。例如這書，大約無論何方的人讀了，都不能不說是很有所啟示的罷，而取材底廣大，更足以令讀者喫驚。雖然不是通體毫無可以討論——例如他說世界語運動全然是知識階級底空想，便是一個很有討論餘地的問題——我們不可不批判地領受；然而總之不失為一本極不平常的又有實益又有趣味的好書，值得慢慢地細細地閱讀。

我們從去年底二月便動手翻譯它，因為人事繁忙，不無間斷，直到去年十月方纔全部告成。却又因為書業驟然發達，印刷追趕不及，直到今日，方纔據說可以出版了。而從譯至今忽忽已經過了一年。其中最感煩難的，是關於各科術語譯名底採

用問題。譯者於此，頗曾經心，使它切合對象而又便於與各科的專書參看。非遇真無現成譯語可用時，決不多造新語，勞人記憶。而所指是什麼，卻務求一目即可了然；故於紛亂或不熟的術語專名，間也註附西文於頁底。

譯時是施先生用的力較多。他又已經獨力將上文說及的“經濟科學”譯出，稱為“經濟科學大綱”，和本書同時印行。遇有本書講技術的或經濟的過程過於簡略不易把握要領處，最好參看那本書。

(1) 插畫，(2) 腳註，(3) 索引——這三項是我們所加，為德日文的本子所原來沒有。日文本是林房雄氏底手筆，可惜頗有誤印處——例如rabota誤印作rapota（見本書9頁）醫學誤印作藥學（見21頁），“技術的法則”五字不斷作一句，與下文“勞動”二字連印（見84頁）“權威的口果性”誤印作“原始的因果性”（見116頁）及其他——我們底這譯本倘亦有此類的錯誤，還請隨時告知，以便改正。

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一日，陳望道。